

第一章

淮勇势自团练起 协剿‘天兵’始受宠

淮军，是 19 世纪 60 年代晚清中国社会的产物，其前身为安徽地方豪绅举办的团练武装。在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条件下，农民战争在客观上为它的产生、发展和壮大提供了先决条件，没有人民起义的威胁，清王朝是决不会允许汉族地主武装兴起的，因此，淮军是在镇压人民起义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的。

淮军的产生和发展须追溯至 19 世纪 50 年代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兴起之时。

1851 年 1 月，以洪秀全等领导的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造反，建号太平天国，军曰太平军。起义军在短短的两年中，由广西出发，经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于 1853 年 3 月占领了南京，并在南京定都，建立了一个与清朝封建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并开始北伐与西征。随着太平天国的蓬勃发展，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以及边疆各族人民纷纷举起义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清农民战争。

这场农民战争的兴起和迅猛发展，引起了清王朝朝野的极大恐慌。清朝最高统治者只得依靠国家正规军——八旗、绿营部队

来阻挡太平军。

清代军制最早为旗兵和绿营。旗兵，是清王朝的原始军制。最初只有 4 旗，以旗帜的颜色别类，分黄旗、白旗、红旗、蓝旗。后增加了 4 旗，它们分别为镶黄旗、镶白旗、镶红旗、镶蓝旗。乃将原来的黄、白、红、蓝称为正黄旗、正白旗、正红旗、正蓝旗，编为左翼，镶黄旗等 4 旗编为右翼，这亦是清军入关前的原始兵力，总称“两翼八旗”。后来又编了蒙古八旗，原有的旗兵则称之为满洲八旗。清军入关后因明军投降并整编，复产生了汉军八旗。以上 24 旗其总兵力达 28 万人。

清统一后，将旗兵中最基本的部队编为“禁旗”。禁旗全为清一色的在长白山下打天下的子弟兵，负责北京警卫和国防之责，相当于中央军。其余汉、蒙、满等 24 旗，约 20 万人，则分别驻防于各省及重要城镇，以为镇服汉人的武力，被称为驻防八旗。

旗兵驻防的地区起初十分谨严，对于镇压汉人的反抗起到了重要作用。是时，八旗官兵都是携带家眷分驻全国各重要地区，防区共有 8 处，有的设驻防将军，有的设副都统，有的设城守尉。国防要地和关外则有防区 25 处，设都统和副都统，如密云副都统、热河副都统之类。

旗营的官兵采取的是世袭制度，数传之后，腐朽不堪，竟有列名行伍而不识弓弩为何物者。至光绪中叶，外侮日亟，满族中有远见的王公大臣也提出了整顿旗营之议，甚至派遣了一些八旗子弟出洋留学，如荫昌、良弼等。同时整理各省驻防旗兵，挑选精壮编成八旗“练营”并出现了“洋枪兵队”、“洋枪马队”、“备练马队”、“洋枪步队”等编制，同时聘任教官进行西式训练。可是，八旗子弟娇生惯养，满洲人当年的骁勇风气已完全丧失，腐化已至不可救药的地步。

比旗兵稍后组成的清军是绿营，与旗兵同称为经制之兵，即

国家的军队。

绿营的制度完全仿照明代，官兵全部是汉人。因其使用的旗帜全为绿色，故称之为绿营。绿营最原始的编制为明朝的降军以及清军收编的队伍。绿营初建时，因为熟悉内地的地理人情，因此镇压汉族反抗十分有效。一般市井之徒，只要考中武科，亦可充任绿营官长遂得借绿营达到骑在人民头上的目的。

绿营归清廷兵部所辖，全国兵营可分为在京和在外两种。在京绿营等由步军统领（即九门提督）统领，下辖左右两翼，各设总兵，总兵之下为城防营，有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另有一部分在京绿营，分别属于漕运总督统辖，专任护漕之责，相当于护路警察部队性质。在外绿营则直属各省，由总督和巡抚节制调度。所以各省督抚的官衔出现了“节制军务兼理粮饷”一项，就是指绿营。

绿营统兵的军官设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百总、处委等。军队编制以营为单位，设管带 1 人，每营兵力 500 人。全国绿营总兵力约 50 万人。

然而此时的达官贵人及其主要支柱绿营兵已腐朽不堪，“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绿营到了清末，饷给过薄，军中虚额很大。缺额高达半数以上，腐败已极。八旗绿营军官可以由捐纳出身。这样，那些不识字的纨绔少年、铜臭商贾，皆以金钱买官而夸耀乡里，鱼肉百姓。军官贪污腐化之风更为突出，上下勾结侵蚀兵饷，以饱私囊。兵籍簿上充满了根本不存在的士兵名字“每年到操演之期，则挪移彼营之兵充此营之额”，甚至以厮役优伶充数额兵之内”。此外，八旗、绿营中有的士兵转而从事其他职业，“或贸易营生，或手艺糊口”，甚至有的去当土匪。这样的所谓国家“正规军”根本无法对付太平军等农民义军的进攻，太平军所到之处，绿营兵和参战的八旗部队望风而逃，“自咸丰二

年粤匪（指太平军）至鄂，迄今不满三载，而全兵覆败、大溃者五次，其间小溃者不可胜数。”“向荣算是当时最有名的将军，他带领的绿营兵从广西跟着太平军，一直‘送’到了南京。南京城边的江南大营就是向荣统领的。以绿营组成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守在南京旁边几年，只能坐视太平军进进出出”。太平军早期的胜利，证实了清王朝的正规军已无力镇压太平军，八旗军和绿营军根本不堪一击，再也无力支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了。

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全国范围的反清狂飚，使以刚刚戴上皇冠的咸丰帝为首的满汉地主阶级统治集团面对着一个风声鹤唳、兵慌马乱的局面。正当地主阶级现有当权势力无力挽救危局之际，一股新的势力却从地主阶级中浮现出来，有些政治地位不高的汉族地主士绅“同仇奋义”，举办团练，协助清军镇压义军，并屡建奇功。面对这种严酷现实，咸丰故伎重演，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清王朝卖命；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地主豪绅的支持，号令各地举办团练，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封建的政治、经济和宗法势力，“结寨团练”，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

团练，亦名为“乡团”，早在唐、宋时代就有，它是地方豪绅的武装力量，其职能主要是为豪强地主看守家园，有时朝廷也借团练力量镇压地方民众势力的反抗。

团练之制古今不同，因地而异。其特点是以居民编户为基础，一般采用保甲制，即“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保有保正，甲牌亦各有长。团练者，即由此保甲中，合其二三保或数保以为一团，各户皆出壮丁，平时则训练，有事时则互相保卫。”“团置团总一人 团副数人 以司本团守御 及与各团联络之事。”

清代团练之制，始于嘉庆年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它的基本内容是地方官以编户保甲为基础，组织乡勇。同时以坚壁清野

之法来对付流动作战的起义军，“使‘贼’无可掠之食，无可窜之路”。

为此，从 1852 年 10 月至 1853 年初，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清廷先后任命的团练大臣计 43 名，奉旨兴办团练的地方共达 10 个省份。曾国藩是当时奉旨回乡办团练的大臣之一，他打破了办团练的老办法，组织了一支新的军队——湘军。

曾国藩（1811—1872），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以后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升任到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因母病故回乡奔丧，清廷乘机命令他在籍兴办团练。但他看到各地团练是保卫汉族地主“家园”的分散的武装力量，根本无法扑灭人民起义的烈火，所以对办团练并不积极。“他（指曾国藩）眼见当时一方面民穷财尽，敛费兴团，不是民力所能负担；另一方面，绅董每借办团横索暴敛来鱼肉平民。他认为团练一事，未见其益，先见其害，主张不应轻易举行。”因此，曾国藩上书清廷，极力详述绿营不可用，兴办团练有困难，大胆地提出了改弦更张另建新军的主张，并提出了编练新军的计划。1853 年初曾国藩创立“湘勇”，即湘军。把中小地主、富农及其知识分子纠集到对付农民起义的“联合”战线上来。

湘军的创立，给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带来了“福音”。这支汉族地主武装在湘南、江西一带镇压太平军过程中，得到地方绅士、地主的支持，逐渐发展壮大，到 1856 年已发展到 6 万余人。不久，其他省份的军队也隶属于湘军，湘军实力达 200 营，约 10 万人左右，成为一支镇压太平军的“劲旅”。湘军是曾国藩私人招募的军队，是国家军制以外的一支新军，只听曾国藩的调度和指挥。

清王朝对地方团练特别重视，专设团练大臣，负责地方办团事宜。《清史稿·兵四》说：“乡团之设，原以使民自卫身家，藉可保全地方，以辅官兵。”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后，各地团练蜂

起，清廷利用团练武装镇压农民起义。“其时署湘乡知县朱孙诒诃知楚粤毗连猝有变无以支柱，遣与诸生罗泽南、王鑫、刘蓉等讲求团练为保卫乡邑计，初未必有意天下事也”。后曾国藩遂挟其军东征，号为“湘勇”。

太平天国前期，安徽是农民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地方豪绅在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处在四面楚歌之中。他们清楚地看到，农民革命战争一旦胜利，自己即将无栖隐之所，因而终日惶惶不安。在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垂死的封建社会内部尚存的一切活力都被调动起来了。为了保卫自己的身家性命，为捍卫几千年来封建秩序，地方豪绅纷纷起来举办团练，对抗农民革命风暴。1858年，“安徽巡抚翁同书疏言皖省定远、寿州、合肥等县举办团练，旬日之间，远近响应。和州踞贼屡出焚掠，多被乡团击回。以其深明大义，踊跃同仇，凡董事团总人等，传谕嘉勉”。咸丰年间安徽团练武装是分散的，常为太平军所击败，但仍非常活跃。

安徽团练在淮军成军之前已经孕育了十年之久。

淮军的将领一般都是淮北的团练首领，淮军的骨干一般都是团练勇丁。这些团练武装的不断发展为淮军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从1852年至1861年，前后10年间，皖北团练曾与太平军、捻军进行了频繁的战斗，历经“大小数百战”。在淮上“为战者二百九十六，杀贼以数万计，而未请一饷，未受一职。”这一帮团练首领与太平军、捻军的战斗各有胜负。但是，不管是胜是败，都增加了其军事斗争的经验，并且提高了作战能力，为淮军的组建准备了各级将佐和骨干。因此，1862年（同治元年）以前为淮上团练的活动，可以被看作是淮军的孕育期。总之，淮军正式成军前，其基础就已经存在。这一基础就是安徽地方团练。1862年春，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创建了淮军，如果没有团练从组织上、思想上为淮军的正式建立作了准备，决不可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拉

起了这样一支凶悍的军队。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这场急剧的社会动荡使一个人不得不以儒生而充军旅。这个人就是翰林院编修李鸿章，后来成为晚清最大的一支军事力量——淮军的创始人之一和总代表。

李鸿章先世本姓许，自江右湖口迁至合肥。合肥位于长江、淮河之间，土地广沃，漉水停注，旱涝保收，“民物殷富，俗尚勤俭而崇节义”。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心庄无子，请求收养迎溪次子慎所为嗣，迎溪慨然允诺，慎所遂改袭李姓。至鸿章高祖时，从“清贫无田”到拥有二百亩土地，表明李氏已经发展成为新兴地主。但因李氏有钱无势，缺少政治靠山，“乡曲豪强屡见欺凌，数起讼端”。鸿章祖父名殿华，字庆庵，“肆武游庠”，两应乡试落第后，便放弃猎取功名念头。

殿华生有四子，依次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长子文煜，字晴岗，庠生。博学能文，著有《晴岗文集》20余卷。次子文瑜，喜好吟咏作赋。三子文球，著有《妙香亭文集》。四子文安，即是鸿章父亲，本名文珩，字式和，号玉泉，别号愚荃，生于1802年（嘉庆六年），文安8岁时因“师有家务”，而自身“少又多病，至年十三仅读四子书及毛诗，而未能成诵”。后跟随长兄文煜读书才有所长进。

1825年后，文安多次赴南京参加江南乡试，结果都名落孙山。这对于一个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士子来说，在精神上的打击是巨大的。深受痛苦折磨的文安，常常借酒浇愁，赋诗自嘲：

年来落魄多贪酒，老去猖狂半在诗。

并写成《自讼十五首》诗曰：

难得群公盼转青，识韩御李旧恩铭。

祇今虚费黄金粟，潦倒风尘两鬓星。

经过锲而不舍的专攻进取，文安终于在1834年考中举人，4

年后又成了戊戌科进士，朝考入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在封建社会里，“权”能转化为“钱”，政治上得势，同经济上致富是密不可分的。一向以“力田习武”为业的李氏宗族，由于文安“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文安夫人李氏秉性淑慎教子有方，堪称封建式的贤妻良母。她生 6 男 2 女，有人担心她家人口众多，生活艰难，而她却坦然以对，并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让诸子“发愤读书”，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下去。

李文安的 6 个儿子，依次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皆用其别号“愚荃”之“荃”字取号。

瀚章本名章锐，号筱荃，生于 1821 年（道光元年），因父亲在京任职，作为长子挑起家庭重担，1849 年终获得拔贡，朝考一等，以知县分发湖南。

鹤章排行第三，本名章铨，号季荃，1825 年生，禀贡生出身。博通经史，有意在科举仕途上与两位兄长一比高低。然而，屡应乡试不第。他抱着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放弃举业，专心“研摩经世致用之学，锐意奋于功名。”最后通过举办团练的途径，终于跻身于清朝统治阶级行列。

蕴章排行第四，本名章钧，号和荃，1829 年生。“年十二病目已而盲”，被迫放弃通过科举门径登上仕途的打算。

凤章排行第五，本名章铨，号稚荃，曾随其父入京读书，但应试不果。曾帮助其父办过团练，镇压捻军时期总理过霆军营务，还在江南制造总局作过事。后来专心经营土地、商业和高利贷事业，成为鸿章兄弟中的首富。

昭庆排行第六，本名章钊，号幼荃，1835 年生。监生出身。但

① 清咸丰、同治年间湘军将领鲍超所部的简称。

在科举仕途上却不甚得意，只好花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以求进身。后因投靠曾国藩，驰逐军旅，才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长女生于 1828 年，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嫁给同县张绍棠，张家较富裕，经常在经济上接济鸿章兄弟。

次女玉娥，嫁给同邑费日启。

出生于官僚地主阶级而经济状况拮据政治权势又不大这样一个家庭的李鸿章，在其生活道路的选择上，就不能不具有提高家庭政治、经济地位的强烈愿望。这一愿望和“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最终造就了一代效忠于清朝统治阶级的忠诚卫士。

鸿章在李文安诸子中，排行第二，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其启蒙教育，是由严父兼良师李文安进行的。1828 年，6 岁的李鸿章开始在父亲开设的家馆中学习。那时的鸿章，由于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应付封建传统文化的科举考试上，所以目光只局限于应试时文和试贴诗等，还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研究。然而，鸿章天资聪颖，加上良师督导，在义理、经济之学和制艺技巧方面进步较快。1840 年考中秀才，岁试时曾被滋园学使拔取第一。1842 年届 20 的李鸿章，长得身躯颀长，精悍之色，露于眉宇。此时他决意克服“因循”积习，珍惜青春年华，“辛勤读五车”，争作像西汉终军、贾谊那样弱冠扬声的人物。

1843 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并北上入都，准备来年顺天乡试。进入作为清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后，李鸿章交游渐广，视野开阔，并得到名师指导，学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李鸿章抵京不久，便以年家子进谒曾国藩。曾国藩与李鸿章父亲为戊戌同年。1844 年李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三场文墨，差堪自满”，结果中试第 48 名举人。此后，李鸿章一面教授居停公子，一面准备会试。并经常出入于曾国藩门下请教诗文。1845 年鸿章参加恩科会议，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官。鸿章虽然会试

落第，但诗文却博得曾氏青睐。

1847 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李鸿章再次参加会试，并脱颖而出，列为二甲第 13 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此次会试正考官潘世恩，副考官杜受田、朱凤标、福济等，座师孙锵鸣。

从 1847 年起，李鸿章与其父李文安，同在京城做官，大约有 5 年时间。1850 年庶吉士散馆，鸿章以成绩优异而改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材之地，掌管朝廷制诰、文史修撰一类工作。按清制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才能入阁为大学士。从 1851 年起，李鸿章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做翰林、纂修等，比较清闲，又能接触宫内藏书，李鸿章利用职务之便，潜心经史，曾写《通鉴》一书。并曾精心写成《文以载道赋》等作品。

关于防止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势力在长江中下游壮大，早在 1852 年（咸丰二年）李鸿章之父李文安频频写信“劝谕乡人先为思患预防之计”，曾经极力鼓动安徽合肥同乡，及早办理团练，准备与太平军对抗。

1853 年 2 月 24 日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徽省城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3 月 1 日尚未接到皖抚毙命奏报的咸丰帝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往安徽，会同蒋文庆、周天爵办理团练防剿事宜。

吕贤基，字鹤田，安徽旌德人，以翰林院编修改御史，累转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他是一位“状貌严毅”、力崇程朱理学的封建官僚。吕贤基回皖办理团练事务与李鸿章有着很大关系，李、吕两家本是世交，当李鸿章在京听到安庆被太平军占领，他“感念桑梓之祸”，便怂恿吕贤基上章并连夜代为捉刀。奏章于次日即被咸丰批复，令吕回乡，吕氏全家哭作一团。吕贤基对李鸿章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同行的还

有刑部员外郎孙家泰，户部主事朱锡麒，刑部通判徐启山等皖籍官员，后又奏调兵科给事中袁甲三，广东知府赵昀赴皖帮办。

回皖后，吕贤基一面和周天爵一起通飭各州县举办团练，并颁布团练章程条款 37 条；一面又分遣李鸿章等属员回籍，“各就乡邑，激劝乡民，且团且练”。

安徽团练由来已久，而最早在安徽倡办团练的，应推寄寓皖北的前漕运总督周天爵，咸丰三年正月，他以兵部侍郎衔会同安徽巡抚蒋文庆办理“防剿事宜”，奏请“将宿迁举人臧纡青团练章程通飭山江皖豫四省遵照办理”获得批准。是时，廷旨周天爵署理安徽巡抚，而周则在宿州疏请迁省治于庐州府，并言军机吏治难以兼顾。于是，咸丰改派安徽学政李嘉端为巡抚，命周天爵以兵部侍郎衔专办皖境团练。咸丰得知蒋文庆死后，命周天爵为安徽巡抚，周以年老力辞，专办皖北团练。其间，周天爵又奏请将省治迁至庐州，并在庐州召募练勇 1500 多人，镇压了庐州北郊的谢（珍科）四老虎“股匪”和定远的陆遐龄起义。其间，其团练活动主要在淮北地区，用以对付捻军活动。咸丰原想依靠吕贤基、周天爵、李嘉端这三位大员以“靖寇氛而固疆圉”稳定安徽局势。但是随同吕贤基赴皖的袁甲三却另有看法，他上疏断言“皖省军务紧要，现办防剿诸臣难持全局”。他认为周、吕、李三人皆属庸庸之流，周天爵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八旬老翁，“一遇事急，立时呕血”，并且只“注意淮北，而于淮南势难兼顾”。吕贤基虽然“一片热肠”但因“书生谈兵，鲜合机宜”对于周天爵的军事布置，“亦断不能赞一辞”。李嘉端“任事太锐，思虑恐难周详”并且与周天爵气机不通，呼应不灵。特别令人忧虑的，是一省之中三帅并立，各争雄长；“事权不一”；“动多掣肘”加之兵力单薄，而安徽“门户太多，处处空虚”，实难抵御造反农民的进攻。以上此般分析，可谓中肯之论。当时的安徽外有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的

威胁；内有风起云涌的以捻党为主体的人民的反抗。1853年5月李嘉端向咸丰叫苦说：全省能够动用的兵额却不过4千余人，像庐州这样的重镇，也只有守兵50余名，“其招募之勇一千余名未经训练，器械不齐，断难任以防剿；又以经费不充，大有欲散之势。”当时的安徽，正处于大风暴的激荡之中。新任皖抚李嘉端除了向朝廷呼救、八方请援外，就只能依靠乡勇了。团练活动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其中以凶悍而著名的有：桐城马三俊，庐江吴廷香、吴长庆父子，合肥张树声和张树珊兄弟，廪生唐令衢，翰林院庶吉士黄先瑜，监生郭有训，廪生吴毓芬，监生姚恩祺，举人周沛霖、赵凤举，副贡生司珣，廪生龚永孚，文生蒯德模、周盛波和周盛传兄弟、唐殿魁、唐定奎、刘铭传、潘鼎新（举人）解光亮、李鹤章等人。此外还有六安李元华、涂宗瀛，巢县张遇春等。团练头子们筑圩练兵，自称圩主，奉行所谓“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的策略，有的藉团练之名，擅作威福，甚至草菅人命，抢夺民财，焚掠村庄，无异土匪。

在安徽团练中，又以庐州（合肥）团练尤须提及。

1853年2月（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经皖东下，到1854年1月首克庐州，庐州团练已初办兴起。李嘉端抵达时，这里已有数支团练武装，一是周天爵招募的1500乡勇，“中多剽悍之徒”已经陆续解散，仅余数百名，仍由周带往滁、凤防堵太平军；二是庐州知府胡元炜联络的徐怀义部乡勇490余人，由候补直隶州知州李登洲选400人带往凤阳，余部由徐怀义添募数百人担任城防；三是李鸿章与户部主事王正谊等在东乡召募的乡兵，这部乡勇随即也由李鸿章选带数百人出境作战。由于太平军大军压境，人心惶恐，合肥又连年饥谨，“盗贼蜂起”，四乡豪绅也纷纷自发地筑堡修圩。因此，就团练的性质而言，有所谓“奉示团练”的官团和结寨自保的民团。

官团的情况，从李嘉端《皖抚疏稿》所附合肥团练议单十一款可知其大概。它的特点是：一、以府县胥吏（如府案刑书王沛，县案刑书郭文焕）和士绅（如监生谢堂、孙上珍）出面约集乡民，并打出“奉示团练”的旗帜，其议单加盖官府印信；二、各团立约后，守望相助，并推举总约首（即“练总”），以军法约束团众；三、向富户摊派捐助（即所谓“富者济贫，贫者护富，不致为匪”）。官团多兴于东乡（如解先亮）北乡（如龚作揖、诸开泰）。

在西乡，势力最强的则是民团，它的起源可以上溯至1846年，乡绅张荫沅（张树声之父）率领族人“以兵法击走”寿州盗，并在周公山下殷家畈筑堡修圩，训练乡勇。太平军莅庐，张树声、张树珊兄弟继承了其父衣钵。与其同时倡办团练者，有大潜山下的刘铭传和紫蓬山下的周盛波、周盛传兄弟。以张、刘、周的西乡三山团练为首，联络附近的唐殿奎、董凤高、丁寿昌、聂士成等各处团练，“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十分剽悍好战。此外，民团和官团的关系是：“寇至则相助，寇去则不攻，视为故常”。平时民团诸堡间也经常攻杀，各争雄长。至于团练的给养，一方面依赖本庄本族的义仓和村民捐助，另一方面向大户强行摊派。因而李嘉端惊呼：庐州“遍地皆贼，遍地皆抢，蹂躏至于通省，蔓延祸及天下”。在农民起义大风暴的冲击下，清王朝地方政权已毫无权威可言。飞鸟各投林，庐州团练的兴起，反映出当地绅民急于自保身家性命而对官府失望的心理。

总之，庐州团练的特点，一是它具有地域性和宗族性；二是它十分顽强好斗。正是这种好勇斗狠的顽强性，使得庐州团练得以在“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生存和发展，从而为淮军的组建打下了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李鸿章部练勇虽然长期在庐州周围作战，但它基本上是自成一系的。李鸿章的主要部属，一是招募合肥东乡

的乡勇，如李胜、浦尚存、张桂芳、宋士猷等；一是收编巢、和、含一带的团练，如王成发及张遇春、张志邦父子等。这些部属除战死者外，余如张桂芳、李胜、张遇春父子等人，后来在淮军中均建立营号，但都不是淮军的骨干队伍。

李鸿章与后来成为淮军主力的树、铭、鼎、庆、盛各部团练头目的关系是：

首先如张树声、张树珊兄弟是李鸿章之父李文安旧部僚属，李文安回乡办团练时，曾将张树声“召襄戎幕”，文安卒后，张树声“与诸团长讲信修睦，联络援应”。隐然成为西乡诸圩之盟主。因此，李鸿章通过张氏兄弟，得以和西乡民团建立联系。

其次如潘鼎新与刘秉璋均是庐江人，两人自幼同村同学，并于 1845 年一同进京赴试，先拜在李文安门下。1847 年李鸿章考取进士，两人又改拜李鸿章为师。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刘秉璋赴皖南成为张芾的幕僚，潘鼎新则由于其父潘璞为太平军所杀，而在三河一带筑圩为练，因此与李鸿章也有着特殊的关系。

第三如吴长庆，其父吴廷香是庐江团练头目，1854 年被太平军镇压，吴长庆单骑出逃，誓报父仇。吴部团练经常和合肥团练协同作战，咸丰 7 年 11 月，他又奉巡抚翁同书令，檄办合肥东乡团练，解先亮旧部如解先搢、解向华、叶志超、王占魁、黄桂荣等悉为其收容。吴长庆和潘、刘二人既是同乡，又有世谊，所以李鸿章通过潘鼎新与刘秉璋，与吴长庆也有联系。

此外，还有李鸿章、李昭庆兄弟先后统带的李氏族丁，以及李文安旧部吴毓芬、吴毓兰兄弟在长临河（今肥东）募集的团练。门生，部属，乡邻，亲族，世谊，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封建关系网，构成了李鸿章建立淮军的组织基础。

此外，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史学界一般以曾国藩创建湘军作为以勇营代替绿营的开端，但勇营制度的起源实可上溯至乾

嘉时期。而李鸿章率领的这部分团练，实际上已具有一种应急募集而成的地方性武装力量——勇营的性质。

是时太平军正忙于巩固南京周围的阵地，尚未派兵北伐、西征；而安徽境内的捻军却一跃，成为当地抗清的主力。捻军，原称捻党，捻党起于清朝初年，始于山东游民。本为淮河两岸以穷苦群众为主体的反抗封建压迫的结社，以后逐渐扩展到山东、河南、江苏北部等地区。其成员有农民、盐贩、船夫、渔夫、手工业工人、饥民、流氓无产者、裁撤兵勇和知识分子等等。起初主要从事抗粮、抗差、吃大户、杀富济贫等斗争，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活动时往往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股，谓之一捻。各部自号为捻，不相统一。各部首领通称捻头或趟主，而捻众“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至 1857 年冬，捻军游骑遂扰及直隶大名府等地，威震北京。

随着太平军跃进长江流域，安徽、河南等地的贫苦群众纷纷结捻响应，开展反清斗争，从而使捻党迅速地 toward 捻军转化。奉命“专司防剿”的周天爵，便把“剿办”皖北捻军、防止其与太平军联合放在首位。追随周天爵的李鸿章，也把刀锋指向了皖北捻军。

李鸿章随同周天爵主要参予了两次较大的绞杀捻军的战役。一次是镇压定远陆遐龄起义。定远，为九省通衢，是捻军活跃地区。陆遐龄（1803？—1853）是定远县荒陂桥旗杆村（现属安徽长丰县沛河乡）人，为地主家庭出身的武秀才，因受到案件株连被关押在安庆监狱。1853 年 2 月，太平军首克安庆，将其救出并派其返回定远组织群众起兵响应。陆遂在家乡举义造反，竖立“随天大王百战百胜”等旗帜，聚众万余，抗击清军。据时人记载，定远知县督兵进犯“两战两败”，而城内团练更“事同儿戏”。其间，合肥夏村夏金书联络陆遐龄“约期大举”，南北呼应。李鸿章闻讯，立即率领团练围捕，杀害金书父子，解散起义武装千余，

“增立东北乡团防”，堵塞了陆遐龄南下的通路。接着李鸿章、李鹤章督团随同周天爵在定远荒陂桥、寿州东乡等地击败陆遐龄起义军。⁴月中旬周天爵诱杀了陆遐龄父子。周天爵奏奖李鸿章六品衔。另一次是镇压活跃于颍州、蒙城、亳州交界地区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1853年5月16日，以林凤祥、李开芳为首的太平军北伐军占领滁州，18日北伐军攻克临淮关，直逼凤阳。5月28日，北伐军一举攻下凤阳。刚刚带团勇进至定远、凤阳交界的李登洲，忽闻凤阳失守，于是率部慌忙退却。李嘉端只得令王正谊、李鸿章“分谕各团首，自店埠至麻布桥排日点验练勇”。只是由于北伐军继续北上，李嘉端、李鸿章才得以逃脱。

正当北伐军挺进豫皖边界之际，胡以晃等统率的太平军西征军又长驱入皖。⁶月10日，北伐军和西征军分别占领亳州和安庆，使李嘉端等陷于两路牵制、腹背受敌的境地。此后一连⁴个月，西征军采取南攻北守的方针，大本营放在安庆，兵锋直指江西。李嘉端为阻止西征军北上夺取庐州，慌忙派遣张印塘、李鸿章分别带领合肥团练数百名，会同巢县团练共1500人驻防集贤关和运漕、东关。集贤关，系安庆北面的重要战略据点。运漕、东关既是巢湖一带和庐州的门户，又是漕粮的集散地和运输孔道。西征军为了取得粮食以接济安庆和南京，进占运漕，迫使李鸿章带练勇千人退防东关。

不久，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奉命到达安庆，在皖北改守为攻，派兵进取集贤关、桐城，清兵勇望风而溃。是时吕贤基驻守舒城，“身旁无一兵”，成了光杆司令。据说李鸿章曾经赶来与吕贤基“议守御”，及至太平军兵临城下，他便立即抛下主帅，骑马逃之夭夭了。

11月，胡以晃督师攻占舒城，吕贤基无法约束练勇号令，同时无力阻止溃兵，走投无路，投水身死。12月，胡以晃挥师直取

庐州。新任皖抚江忠源固守待援。江忠源，湖南新宁人，字常孺，号岷樵，湘军核心人物，曾国藩“骨肉至交”。时李鸿章率勇驻扎合肥冈子集。江、李彼此不熟，曾国藩从中撮合，希望他们“鍼芥契合”。由于江忠源抵庐后两天即被困于孤城，李鸿章本想援救江氏和庐州，但却力不从心。他亲自晋见率军来援的清陕甘总督舒兴阿，表示“所有先经团练之壮丁，今愿自备口食，随同官兵击贼自效”。其间，咸丰命江南提督和春总统城外援军万余，但因太平军西征军异常英勇，舒兴阿胆怯徘徊，坐失战机，翌年 1 月，庐州终于易手。江忠源投水毙命。李鸿章败撤，淮勇家园被毁。

太平军西征军攻克庐州之后，巩固了太平天国在皖北的统治。咸丰急派福济为安徽巡抚，令其会同和春等力挽皖北危局。福济，满洲镶白旗人，始必禄氏，字元修，道光进士，是个典型的贵族老爷，既缺少应变之才，又不懂用兵之道。他曾任丁未科进士副考官，是李鸿章的座师。福济抵任，召李鸿章入幕，由于这层关系使李鸿章一意奉承福济，在与太平军交战中格外卖力。鉴于连克庐州不下，福济、和春改变强攻庐州的作法，决定采取“歼其外援殆尽，然后乘其内蹙而攻之”的战略，分军进犯东南的含山、巢县和西南的舒城。李鸿章“时在庐州戎幕，慷慨请行，福巡抚壮之”，令其率领千总莫清云会同佐领吉顺统带吉林马队绕道攻取含山。1855 年 2 月，李鸿章督兵勇侵占含山，残杀太平军总制罗绪光以下千余人，因功赏知府衔。在此期间，淮军集团的其他成员活动也颇为频繁。如六安州举人李元华与知州茅念劬攻陷六安州。参加这次战斗的还有刘铭传、史克宽、史克信、史克己等。李元华又与知州博勒霍布攻陷英山。吴延香、吴长庆攻陷庐江。同年秋，太平军反攻，攻破庐江，吴延香败死，由吴长庆统领该部练勇。此后，李元华、博勒霍布攻陷太湖，练首史克谐被击毙。同年 7 月，李文安突然死于合肥军次（李文安系因户部左侍郎王茂